



# 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

晋 文

**摘要:**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匈奴强盛时期,其战争诉求是凭借强大的骑兵逼迫汉朝承认匈奴的大国对等地位,还要勒索汉朝更多的钱财物品和公主,并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在匈奴由盛转衰时期,是要击败汉朝,恢复于己有利的和亲。就算不能完全击败汉军,也要把战争作为恢复和亲的筹码。而衰亡时期,则仅仅表明了匈奴的一种对抗和存在。总的来看,在国力强盛时期,匈奴的战争诉求曾大获成功,但在其他时期都并未达到目的。

**关键词:**匈奴;两汉王朝;战争诉求;综合国力;民族意志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5-0055-06

两汉时期,汉朝同匈奴之间的战争或和亲曾交替进行。匈奴的战争诉求也充分体现了匈奴的政治诉求和自身利益<sup>①</sup>。限于史料,本文仅就汉文记载对这一问题略作分析。

匈奴对汉朝的战争诉求大致可按匈奴的盛衰分为三个时期。

## 一、匈奴强盛时期的战争诉求

这一时期基本上与西汉前期重合。从零散的史料可以看出,匈奴的战争诉求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凭借强大的骑兵逼迫汉朝承认匈奴的大国对等地位。匈奴曾被秦始皇击败,也曾受到东胡和大月氏的欺凌,因而在汉匈战争中希望一雪前耻,使汉朝重新认识匈奴的军事实力,便成为匈奴的最大诉求。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白登之围冒顿单于对匈奴军力的炫耀。当时

“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sup>[1]2894</sup>。冒顿还按马的颜色把匈奴骑兵分为四个方阵,“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骊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驸马”<sup>[1]2894</sup>。根据冒顿单于的大阏氏所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sup>[1]2894</sup>由此可判断匈奴还没有侵占中原的野心或意图,其目的在于打败高祖和炫耀武力,也就是要给汉朝一个教训,让汉朝明白匈奴是一个与自己相匹敌的大国,甚至在军力上更胜于汉朝。从结果来看,匈奴的这一诉求得到了全面实现。汉王朝不仅屈辱地提出和亲,史无前例地和匈奴“约为昆弟”<sup>[2]3756</sup>,承认“汉与匈奴邻敌之国”<sup>[2]3762</sup>,在冒顿单于“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sup>[2]3757</sup>的夸耀和威慑下,汉文帝还一再重申:“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sup>[1]2902</sup>可以说,匈奴通过战争已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大国和强国地位。

收稿日期:2023-05-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思想通史”(20@ZH026)、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秦汉卷。

作者简介:晋文,男,南京师范大学随园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97),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二是通过各种规模的侵扰强迫汉朝贡奉公主(翁主)和更多的钱财物品。从生产方式来看,游牧民族通常存在产品单一且严重依赖水草的弱点,对自然灾害的抗御能力也远比农耕民族低。按照分工和互通有无的原则,在和平环境下,游牧民族都乐意同农耕民族进行产品交换。但总体来说,除特殊情况外,自给自足的农耕民族对互市的需求低,而游牧民族则对互市的需求高<sup>②</sup>。因此,在需求无法完全满足的情况下,许多崇奉功利的游牧民族都会采用暴力手段来抢掠农耕民族和弱小民族的人员和财富。特别是拥有强大军力的游牧民族,更会通过战争公开进行抢掠<sup>③</sup>,并逼迫农耕民族和弱小民族向自己大量进贡。匈奴对汉朝的不断侵扰和抢掠也不例外。中行说和汉使辩论,公开威胁说:“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穡耳。”<sup>[1]2901</sup>匈奴的实际抢掠情况,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如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sup>[1]2895</sup>;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侵,“虏人民畜产甚多”<sup>[1]2901</sup>;“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sup>[1]2901</sup>;军臣单于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sup>[1]2904</sup>。汉朝在匈奴每一次侵扰后的和亲,也几乎都把通互市和增加贡奉作为求和条件。如文帝“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sup>[2]3831</sup>。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sup>[1]2904</sup>。汉朝还多次向匈奴贡奉公主(翁主)。这就更加说明匈奴的战争诉求是强迫汉朝贡奉公主(翁主)和更多的财富<sup>④</sup>,并基本达到了目的。

三是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掌握同汉朝和、战的主动权。自汉高祖与冒顿和亲后,至汉武帝即位,史载匈奴的所有寇边都是匈奴毁约在先。正如班固所说:“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sup>[2]3830-3831</sup>这充分表明匈奴就是要凭借武力来

掌握与汉朝和、战的主动权,无论什么时候和亲,亦无论什么时候发动战争,均必须由匈奴决定,并形成其强大的军事威慑。而汉朝却不得不被动接受匈奴的和亲或战争,且恢复和亲要增加贡奉,汉朝所谓战争也仅限于军事防御罢了。特别是匈奴骑兵屡屡对汉军边防的打击,给汉朝君臣更是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曾造成大多数人对汉匈战争的恐惧心理<sup>⑤</sup>。晁错便痛心疾首地指出:

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sup>[2]2278</sup>

从某种意义上说,之所以娄敬、季布、汲黯和韩安国等都主张和亲,甚或提出匈奴不可战胜之说,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sup>⑥</sup>。所谓“百约百叛”,以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sup>[1]2861</sup>云云,亦证明匈奴的战争诉求在军事上曾大获成功。

## 二、匈奴由盛转衰时期的战争诉求

这一时期大致与西汉中期重合。匈奴的战争诉求主要是击败汉朝,并恢复于己有利的和亲。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无论汉朝还是匈奴,在战争未有结果的情况下,实际上都不可能再接受原先的和亲政策了。特别是崇奉武力的匈奴,更不可能主动向汉朝求和。《汉书·匈奴传下》载:“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sup>[2]3797</sup>反映了大多数匈奴人的心声。因此,在大规模战争爆发后,匈奴的战争诉求就是要击败汉朝,以逼迫汉朝签订更为屈辱的和亲条约。

事实也是如此。据《史记》《汉书》记载,自马邑之谋后,匈奴便开始大规模向汉朝入侵。“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sup>[1]2905</sup>但在战争前期,由于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汉朝组建骑兵大军团主动向匈奴进攻后<sup>⑦</sup>,匈奴接连战败。汉

朝不仅收复了秦朝的失地,设河西四郡,而且将匈奴逐出了漠南,尽管匈奴的侵扰仍取得一些战果。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sup>[1]2911</sup>  
至武帝后期,匈奴对汉朝的军力有了清醒认识,不再盲目自大,因而改变战术,战局才得以扭转<sup>⑧</sup>。其中最主要的改变,就是尽最大可能集中匈奴的优势兵力。如赵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sup>[1]2915</sup>;“匈奴兵八万骑围之”<sup>[1]2915</sup>;李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sup>[1]2917</sup>;“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sup>[1]2918</sup>;“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余人,兵及食尽,欲解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sup>[1]2918</sup>;“汉使贰师将军六万骑,步兵七万,出朔方”<sup>[2]3777</sup>;“匈奴闻,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待水南,与贰师接战”<sup>[2]3777-3778</sup>;“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sup>[2]3778</sup>;“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sup>[2]3778</sup>。加之汉军指挥不当<sup>⑨</sup>,特别是朝中内乱和李广利的冒进,因而汉军曾数次被匈奴击败。但总的来看,武帝后期的汉匈战争已呈现出汉朝略强于匈奴的相持局面。

尽管如此,匈奴的国力仍受到重创,由强盛转为衰落。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匈奴左伊秩訾王便总结说:“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sup>[2]3797</sup>因此,在汉匈国力消长的情况下——匈奴越来越看不到战胜汉朝的曙光,而汉朝则越来越接近“威服”匈奴的终点——双方对和亲的态度都产生了变化。匈奴希望停战,能恢复和亲。但汉朝的战争形势于己有利,不可能以胜利来换取失败的和亲,这等于汉朝付出了巨大牺牲,结果却不败而败,匈奴被汉朝大败却不胜而胜。所以汉朝也强硬回答,汉匈可以停战,但和亲的前提是匈奴必须臣服。如《史记·匈奴列传》载:

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

往。匈奴用赵信之计,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任敞于单于。<sup>[1]2911</sup>

当然,在匈奴的军力还能与汉朝大体抗衡的情况下,这种使匈奴成为汉朝“外臣”的条件匈奴肯定是不能接受的<sup>⑩</sup>。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匈奴对恢复和亲的条件也不断变化。一般来说,当汉军取得重大战果或匈奴出现严重困难时,匈奴的和亲条件都会做出一些让步。如武帝乘胜“巡边,亲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士马,习射猎,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sup>[2]3771-3772</sup>。再如李广利征服大宛后,且鞮侯单于“恐汉袭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于汉”<sup>[2]3777</sup>。而匈奴若取得重大战果时,则态度强硬,要求恢复“故约”,并附加更多贡奉的和亲条件。如李广利战败被俘后,狐鹿姑单于便遣使提出了上述要求。《汉书·匈奴传上》载:

其明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闾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麩酒万石,糴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sup>[2]3780</sup>

更不用说,此后几任单于也都一边向汉朝入侵,一边又提出和亲。尽管战争使匈奴损失惨重<sup>⑪</sup>,但匈奴上下却深知,若完全放弃战争,向汉朝称臣,则意味着投降,要恢复其“故约”的和亲亦无从谈起。史载汉武帝派使者提出:“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sup>[2]3773</sup>乌维单于便直截了当拒绝说:“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sup>[2]3773</sup>这样才出现了匈奴急欲和亲却又不断侵扰的情况。如“壶衍鞮单于既立,风谓汉使者,言欲和亲”<sup>[2]3782</sup>;“后二年秋,匈奴入代,杀都尉”<sup>[2]3782</sup>;单于和卫律“乃更谋归汉使不降者苏武、马宏等……欲以通善意”<sup>[2]3782</sup>;“明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sup>[2]3783</sup>。此亦充分证明,在不能完全击败汉朝的情况下,匈奴仍有对汉战争的诉求,并经常寇边,实际是把武力对抗作为一

种同汉朝恢复和亲的筹码。只不过国力衰弱,匈奴的这种诉求已很难达到目的了。

### 三、匈奴衰亡时期的战争诉求

这一时期大致从西汉元帝开始,至东汉和帝结束。其中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一是西汉元帝前期。由于战争、灾害和内乱,自宣帝五凤年间(公元前57年—公元前54年),匈奴便分裂为以呼韩邪为单于的南匈奴和以郅支为单于的北匈奴。为了自保,呼韩邪单于被郅支单于击败后,于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决定“称臣入朝事汉”,并“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铄娄渠堂入侍”<sup>[2]3797</sup>。也就是说,南匈奴完全接受了汉朝的臣服和质子的和亲条件。基于同样目的,“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sup>[2]3797</sup>。但北匈奴似乎没有称臣,质子的级别也比南匈奴低,并未完全接受汉朝的和亲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对南北匈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稽侯来朝,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藩臣而不名”<sup>[2]271</sup>,并赐予大量钱财和物品。对北匈奴的求和,汉朝也不拒绝,但待遇要大大低于南匈奴。“是岁,郅支单于亦遣使奉献,汉遇之甚厚。明年,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sup>[2]3798</sup>于是“郅支单于远遁,匈奴遂定”<sup>[2]271</sup>。

元帝继位后,呼韩邪单于更加亲汉,完全放弃了战争诉求。汉朝也为解决南匈奴的生计问题提供了大量援助。为了汉匈长期友好,车骑都尉韩昌和光禄大夫张猛还代表汉朝和呼韩邪签订了一个和平盟约:

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sup>[2]3801</sup>

这些都为西汉后期汉匈人民的友好往来奠定了坚实基础。而郅支单于则坚持与汉朝为敌的立场,“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遣使上书求侍子。汉遣谷吉送之,郅支杀吉”<sup>[2]3801</sup>。郅支单于为逃避汉朝和呼韩邪的打击,乃西迁康居。最终在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被甘延寿、陈汤

等率军诛灭,从而终结了西汉后期匈奴的战争诉求。

二是东汉光武帝前中期。匈奴对中原王朝的重新侵扰,是在王莽新朝时期。随着新朝与匈奴的反目,继之绿林和赤眉起义,匈奴的势力又逐渐强盛。在这种情况下,匈奴便不再承认汉朝的宗主国地位,而要求复尊匈奴为上国。呼都而尸单于的态度便突出反映了这一点。

更始二年冬,汉遣中郎将归德侯飒、大司马护军陈遵使匈奴,授单于汉旧制玺绶,王侯以下印绶,因送云、当余亲属贵人从者。单于舆骄,谓遵、飒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遵与相撑距,单于终持此言。<sup>[2]3829</sup>至光武称帝后,匈奴的势力更大,呼都而尸单于以其复兴之功竟“自比冒顿”。《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

建武初,彭宠反畔于渔阳,单于与共连兵,因复权立卢芳,使入居五原。光武初,方平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归德侯刘飒使匈奴,匈奴亦遣使来献,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旧好。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数与卢芳共侵北边。九年,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抄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于是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已东,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乃遣芳还降,望得其赏。而芳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单于复耻言其计,故赏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党、扶风、天水。二十一年冬,复寇上谷、中山,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sup>[3]2940</sup>

因此,匈奴的战争诉求就是要重振冒顿雄风,既要恢复匈奴之于汉朝的兄弟之国或上国地位,又要恢复汉朝对匈奴大量贡奉的和亲政策,还要拥有随时对汉朝侵扰的主动权。为了达到目

的,匈奴还把卢芳扶植为傀儡皇帝,“乃使句林王将数千骑迎芳,芳与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单于遂立芳为汉帝”<sup>[3]506</sup>。然而时过境迁,呼都而尸单于的功业已不可能达到冒顿单于的高度。在“安内”然后“攘外”思想的指导下,东汉王朝对匈奴的侵扰采取了一种暂时拖延的“羁縻”政策。无论是承认匈奴的大国地位,还是汉匈恢复和亲,抑或防御匈奴的侵扰,光武帝都虚与委蛇,充满自信地淡然处之<sup>⑩</sup>。一方面承认匈奴的大国地位,不再要求匈奴臣服;另一方面同意和亲,互赠的钱财和物品也多于匈奴,但决不采用向匈奴贡奉的方式。至于军事防御,则将边郡民众迁往内地,并增加边防力量和设施,尽最大可能把战火限制在边境地区<sup>⑪</sup>。这些做法都使得匈奴的战争诉求大打折扣,无法得到所期望的效果,而汉朝却得大于失。所以班固曾赞叹说:“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sup>[2]3834</sup>

三是东汉明帝前期。自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汉匈战争又形成对汉朝极为有利的局面。为避免重蹈覆辙,在南匈奴内附后,北匈奴也改变政策,不再用武力谋求匈奴的上国或强国地位,而是向汉朝多次求和。比如:

北单于惶恐,颇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抄兵每到南部,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莫鞬日逐耳,非敢犯汉人也。”<sup>[3]2945</sup>

(建武)二十七年,北单于遂遣使诣武威求和亲。<sup>[3]2945</sup>

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sup>[3]2946</sup>

三十一年,北匈奴复遣使如前。<sup>[3]2948</sup>

光武帝对此也采取和平交往的“羁縻”政策,以减少战争,恢复边境的安宁。如建武二十八年(52年),汉朝“赉杂缯五百匹,弓鞬鞞丸一,矢四发,遣遗单于。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剑各一”<sup>[3]2947</sup>。建武三十一年(55年),光武帝“乃玺书报答,赐以彩缯,不遣使者”<sup>[3]2948</sup>。可以说,直到光武帝去世,北匈奴同汉朝基本上都处于停战状态<sup>⑫</sup>。

但好景不长,在明帝即位后不久,北匈奴又

开始奉行对汉朝侵扰的政策。如永平五年(62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南单于击却之,西河长史马襄赴救,虏乃引去”<sup>[3]2948</sup>。永平六年至七年(63—64年),“时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sup>[3]2949</sup>。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观原因是,北匈奴不愿意完全放弃与东汉王朝的武力对抗政策,总想随时抢掠汉朝的财富和边民;而客观原因是,在汉朝大力扶持南匈奴的情况下,北匈奴与汉朝的停战收获不大,未能达到其预期效果。加之南匈奴意图彻底击败北匈奴,重新统一匈奴,对北匈奴与汉朝的和平交往采取了隔绝政策;一些北匈奴部众也感念西汉后期的和平生活,不断向汉朝和南匈奴归降,如“永平二年,北匈奴护于丘率众千余人来降”<sup>[3]2948</sup>。所以北匈奴便饮鸩止渴,故技重施,对东汉王朝多次侵扰。当然,限于国力,北匈奴的寇边也并非要和汉朝决一死战,而是希望通过武力侵扰,逼迫汉朝扩大与北匈奴的互市。这可以说是北匈奴的一个最主要的战争诉求。前述“时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会北单于欲合市,遣使求和亲,显宗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许之”<sup>[3]2949</sup>,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证。

尽管如此,东汉王朝对北匈奴的退让也是有限度的。但北匈奴却由此误判形势,认为汉朝软弱可欺,其侵扰已取得预期效果,因而变本加厉,“复数寇抄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帝患之”<sup>[3]2949</sup>。终于在国内逐渐安定的情况下,汉朝不久便对北匈奴重新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永平)十六年,乃大发缘边兵,遣诸将四道出塞,北征匈奴。”<sup>[3]2949</sup>此后形势逆转,北匈奴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汉军和南匈奴、乌桓兵的联合攻击下,北匈奴逐渐瓦解,不仅大批民众纷纷向汉朝归附,而且对汉军的防御屡战屡败。如元和二年(85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入塞,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sup>[3]2950</sup>。从这个方面来说,北匈奴的战争诉求在当时也仅仅表明了一种对抗和存在而已。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便完全终结

了。尽管此后南匈奴内部还有一些反叛,但作为一个民族或“汗国”的战争诉求已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既经历了一个从确立大国和强国地位到沦落为求和筹码的过程,也经历了一个从抢掠有理到仅仅表明匈奴的一种对抗和存在的过程。在上述过程中,匈奴的有识之士曾贡献出许多聪明才智,但最终匈奴都无可挽回地衰落下来,成为两汉王朝的藩国或“外臣”。这充分说明中原王朝的综合国力要远远强于草原民族。从长远来看,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势力彼此消长的关键还在于中原王朝的内部能否安定,以及战胜游牧民族的决心和时机选择问题<sup>⑤</sup>。令人感慨的是,匈奴“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但最终却被更为强大的汉王朝“威服”。这对于一味诉诸武力来处理民族关系的王朝或帝国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 注释

①关于匈奴对汉朝的战争诉求问题,学界以往研究较少。从宏观方面涉及这一问题的,主要有林幹:《近六十年来(1919—1979)国内研究匈奴的回顾》,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9页;杨建国、杨东晨:《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述评》,《宝鸡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周聪:《近四十年来汉匈关系研究综述》,《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7期;等等。而涉及中观和微观研究

的,则主要有莫任南:《匈奴对汉王朝的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宋超:《汉匈战争对两汉社会心态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同利军:《汉朝与匈奴战争述评》,《军事历史》2009年第1期;王绍东:《冒顿单于的战争策略透视》,《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王绍东:《从汉匈战争看大规模战争对游牧民族的负面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晋文:《两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诉求》,《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8期;等等。②林幹:《匈奴社会制度初探》,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第294页。③莫任南:《匈奴对汉王朝的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④王绍东:《冒顿单于的战争策略透视》,《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⑤⑩宋超:《汉匈战争对两汉社会心态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⑥⑫晋文:《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发展与完善》,《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⑦⑬⑮晋文:《两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诉求》,《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8期。⑧⑨同利军:《汉朝与匈奴战争述评》,《军事历史》2009年第1期。⑪王绍东:《从汉匈战争看大规模战争对游牧民族的负面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⑭陈金凤:《汉光武帝边防政策及其相关问题论析》,《史学集刊》2008年第1期。

####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The War Appeals of Hun towards the Former and Later Han Dynasties

Jin Wen

**Abstract:** The war appeals of Hun towards the former and later Han dynastie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During 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Hun, their war appeals were to use their powerful cavalry to force the Han dynasty to recognize the equal status of Hun as a major power, and to extort more money, goods, and princesses from the Han dynasty, forming a strong military deterr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Hun's transition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they aimed to defeat the Han dynasty and restore advantageous peace-making marriage to them. Even if they cannot completely defeat the Han army, they must still use war as a bargaining chip to restore peace-making marriage with the Han dynasty. During the period of decline, it only indicated a form of confrontation and existence of Hun. Overall, during the period of strong national power, the war appeals of Hun were greatly successful, but they did not achieve their goals in other periods.

**Key words:** Hun; Han dynasty; war appeal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national will

[责任编辑/启 轩]